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16)

劉道玉

八、珞珈山上的快樂學院

在倫理學上，有一個「快樂論」，認為快樂是人生的最高幸福，追求快樂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標準。

快樂學院是指什麼？它是一個特殊的學術社團——多學科討論會，是 20 世紀 80 年代初，武漢大學的一批思想活躍的大學生的創舉。它的首創者是誰現在已無法考證了，但是哲學系 78 級學生艾路明，計算機系 77 級學生柴瀟涌，中文系 78 級學生弓克，以及他們身邊的那一批想成為「九頭鳥」的人，無疑是最活躍的分子。快樂學院的成立，得益於武漢大學當時的民主自由的校園文化氛圍。那時的武漢大學被稱為「解放區」（意指思想極為解放），不僅沒有其他學校「三不准」（不准談戀愛、不准跳交誼舞、不准穿奇裝異服）的規定，而且取消了專司管理學生的專職政治輔導員制度。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我提出大學生應當運用兩個課堂進行學習，這就是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前者是教學計畫規定的學習內容，後者是指課外的學術社團活動，但每個學生必須至少要參加一個自己喜愛的學術社團，如果沒有那就應當去創建一個合乎自己需要的學術社團。這是學習成才的需要，是獲得全面知識的需要，如果一個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沒有參加任何一個學術社團，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學生。

恢復高考以後的幾屆學生，他們思想解放，價值觀念超前，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捨我其誰」的超級自信。於是，他們一進校就沒有把自己禁錮在一個狹窄的專業裡，而是把目光瞄準到各個學科最前沿的知識。因此，各個系的同學都去與其他系的同學交朋友，從聊天吹牛開始，交流各自的新

鮮見聞，終於一個新的多學科討論會，在 1981 年秋高氣爽的季節裡誕生了，並給它取了一個昵稱：「快樂學院」。

在討論這個社團的宗旨時，更是百花齊放，充分地顯示了那一批學生的創造靈感，具有快速計算機腦袋的柴瀟涌提出：「多學科討論會只應有一個宗旨，即不拘泥於一種固定章法。」數學高材生、全校數學競賽一等獎獲得者陳華說：「我的章法是，構造一個高維精神空間，它有著處在低維空間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奇跡般的思維自由。」在《中國青年報》上開展關於人生觀大討論中出了名的歷史系學生趙林說：「中國歷代都以謙謙君子為美，我們多學科討論會要以有顯示慾的人為美，惟有每人極力表現自己，別人才會獲益，才會變成‘九頭鳥’。不然大家都說‘對對對，好好好’，我們就會感到自己是在對著鏡子說話，浪費生命，而且極其乏味。」全校寫作比賽一等獎獲得者圖書館系 77 級學李雲帆，提出了一個更獨特的價值標準：一個人主講一個課題，其他的人不管是贊成抑或是反對，都要群起而攻（或刁難）之，誰提的問題越刁，越有創意，那麼他就越高明，給他打一百分。這是刺激積極思維，並且使命題立於不敗之地的最佳方法。我們把多學科討論會變成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室。」

對於多學科討論會上討論的觀點，到底要不要統一認識呢？對此，溫文爾雅的中文系 78 級學生弓克的一番話，使大家豁然開朗。他說：「多學科討論本來就是一個不一致的整體，大家來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求不一致，因此，不一致造成的危機正是最好的危機，是嬰兒產出前母體陣痛的危機，而不是因為相同得乏味而要離析的危機。我們多學科討論會的人，不一定是武漢大學最出色的人，但肯定是興趣最廣泛的而又是千差萬別的人，是敢於接受新東西的人，是敢於探討別人必信的東西的人。」

每個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學科討論會的例會，屆時各個系

的一些「不安分」的學生不約而同地聚集到學生會議室，展開了真正的高談闊論，唇槍舌戰，氣氛熱烈非凡。雖然他們討論的面紅耳赤，甚至是聲嘶力竭，但是這個學術小團體却雷打不散，他們個個都是快樂的人。

他們不僅討論的問題新穎，而且討論的方式也很特別。例如，有一個「畢加索」的講座，主講人不是一個而是三個：一個講，一個問，一個評論，弓克說：

「畢加索是西班牙畫家，1881 年出生的時候是個死嬰，被撻在桌子上不管了。他的叔叔是個醫生，叫薩爾瓦，他吸了幾口雪茄烟通過導管吹入畢加索的小肺裡，畢加索活了，尖叫了起來……」

陳華插話：「這麼說，是偶然性創造了偉大的畢加索。」

李雲帆馬上投出他的殺手鐮：「請問主講人弓克，你發現畢加索偉大在什麼地方？」

本來有點害羞的弓克，却如行雲流水似地論述道：「畢加索的偉大在於，他是一個創新魔，一輩子都在改變自己的畫風。對別人是終點的地方，對於他來說就是起點。他號稱‘藝術變色龍’、‘邪惡的天才’。在歐洲，如果兩輛汽車相撞，司機會罵道：‘難道是畢加索！’畢加索同怪異成了同義語。他活了 93 歲，一生留下了油畫 1800 件，版畫 30000 件，素描 7000 幅，手稿 100 萬件，這是繪畫界的天文數字……」他們就是這樣問一答地進行討論，並且不斷地展現畢加索的畫。針對不同愛好的快樂學院的成員。弓克補充說：「我們可以不喜歡畢加索的畫，但是每個站在畢加索畫面前的觀眾，都會被震撼，被塑造，我們認為，藝術力就表現在對觀賞者的塑造力。塑造力越大，藝術的魅力感大！」

多麼精闢的見解，這哪裡是出自於非科班的大學生之口，完全猶如學術權威的宏論。據不完全的統計，在快樂學院討論的論題還有「超級計算機」、「生物變異新觀」、「外來文化論」、「黑洞是什麼？」、「浪漫主義」、「耗散結構理論」、「有萬有斥力嗎？」、「罷免權淺議」、「邏輯實證主義與偽證主義」等等。僅從這一批題目可以看出，他們敢於向權威挑戰，勇於探索未知，這正是快樂學院成員所具有的最可貴的素質。

在校內，對於快樂學院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持反對的或貶斥意見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把快樂學院說成是“狂人會”，是“吹牛皮會”，把多學科討論會的成員比擬為“嬉皮士”。針對這些非議，我明確地支持多學科討論會，並且擔任了多學科討論會的名譽會長，參加他們的討論會，在一次討論會上，我鼓勵他們說：“為人類已經進入科學技術革命時代，多學科的研究是科學發明最深廣的源泉。例如，原子彈，計算機，激光，基因工程，控制論等重大發明，都是誕生於多學科交叉與合作的產床上。”

在多學科討論會的帶動下，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漢大學學生學術社團蓬勃發展的時期。據不完全的統計，全校有各類社團 400 多個，如「浪淘石」、「櫻花詩社」、「珞珈山」、「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讀書俱樂部」等等。那時，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確有一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數不清的社團中，有誰相信居然還有一個「納粹主義研究會」。在成立這個社團時，歷史系一位同學找我，他說：「校長，我們要成立一個納粹主義研究會……」聽後，我楞了一下，沒有吭聲。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慮，於是他補充說：「我們絕不是崇拜納粹主義，崇拜希特勒。恰恰相反，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注意。我們是學歷史的，成立納粹主義研究會」正是為了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納粹主義，鼓吹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災

148 難，從而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我說：「啊，原來是這樣。好吧，我就同意你們成立，我相信你們！」

學術社團興起的同時，武漢大學學生中的學術刊物也像兩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例如，歷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學系的《趣味化學》，管理學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這一代》等，在當時都是辦的比較好的學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結出豐碩的成果。據統計，我校 77 級至 80 級四屆本科生，在全國 50 多種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作品 1570 篇，出版書籍 14 本。在湖北省 1984 年 40 多所大學學生科研，創作成果競賽中，武漢大學 85 名學生的 39 項成果獲獎，佔全省獲獎人數（150 人）的一半以上。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漢大學校園文學創作勃興的時期，不僅活躍了同學們的校園文化生活、陶冶了他們的情操，而且也培養了一批在當代文壇上十分活躍的，優秀的青年作家與詩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由中文系 77 級同學集體創作的《珞珈山組歌》和《周總理在珞珈山組詩》，就是他們留給母校的最好的畢業紀念。

生動活潑的學術社團活動，不僅豐富了第二課堂的學習內容，而且還推動了第一課堂的數學改革。如果我們以快樂學院來形容學術社團活，那麼我們能否通過提倡樂教、樂學，使整個大學變成一所大的快樂學院，把大學生們從「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煉獄式的學習中解放出來呢？這不僅是必須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實，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倡樂學。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所說的「樂之者」就是善於樂學的人，這是學習的最高境界，是我們應當大力提倡的。

爲了實行樂學，最重要的是轉變教育觀念，改革「三中心」（以課堂爲中心、以教師爲中心、以書本爲中心）的傳統的教學模式。要尊重學生的志趣，保護學生的選擇權利，提倡自

學，採用啟發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許自由聽課。我歷來主張，教育最高的原則是教而不是罰，不贊成用點名、扣分、留級、退學等辦法懲罰學生。實踐證明，這些辦法從來不可能起到調動學生積極性的目的，而只能造成學生心靈上的創傷。

樂學的關鍵在於教師，只有教師樂教，才会有學生樂學。我校數學系教授路見可，教學得法，能深入淺出地把深奧而又抽象的數學理論，講得生動易懂，深受學生歡迎。學生對我說，聽他的講課是一種享受，如果誰因事請假，那一定會委託同學把他的講授錄音下來，以備品嚐其中的快樂。這就證明了一條教育原則：對於教師來說，能深入淺出的是好老師；對於學生來說，能淺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學生。

一個掌握了樂教的教師，他不會用點名來把學生束縛在課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學藝術來吸引學生。我十分欣賞和支持經濟系一位中年教師的做法。他向學生宣布：「凡是選修我的課程者，可以實行‘三許三不許’：允許不來上課，但不允許遲到；如果對本人的講授不感興趣，允許在課堂上看其他書籍或做別的事，但不允許講話；如果你實在困乏了，允許在課堂上睡覺，但不允許打鼾。」這個規定既幽默又耐人尋思，的確不愧為開明之舉，因而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無疑，敢於做出如此提定的教師，本身就是敢於向自己挑戰，也是他的能力與自信的表現。這個做法實施以後，獲得了與規定內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課時，不僅沒有缺席的，也沒有在課堂上打野的、睡覺的。相反的，他的課年年紅火，堂堂爆滿。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學法的魅力。我始終認為，學生厭學、逃課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師教學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國各大學在端正學風、嚴肅學紀的統一部署下，各地把清理不合格的學生當作一項重要任務。從媒體上不斷獲悉，不少學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學習不好的學生退學了。面

對這種情況，我陷入了深思：我們大學的領導人，在處分學生、行使自己權力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作為教者的義務是什麼？我們是否想到，那些被趕出校門的學生真是愚不可教嗎？退學又會對他們未來的命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那一次整肅學風中，我校教務處也進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兩門或兩門以上不及格經補考仍不及格的學生 25 人。按照學籍管理規定，應勸其退學，別的學校也都是這樣做的。然而，除了違法者和屢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況下，我是反對處罰學生的。為此，我召開校長辦公室會議，專門研究了如何處理 25 個學生的問題。兩千多年以前，孔夫子就說：「不教而誅，謂之虐。」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為處理 25 個學生，我提出三條原則：一是凡學了三年者、可發給大專畢業文憑，並盡可能推薦介紹適合的工作；二是學習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為專業學習興趣不對口味而影響學習成績者，應允許轉入其感興趣的專業學習，但要跟下一屆學習；三是如果是因為學習基礎太差，允許留級，採取特殊的幫教措施，力爭使他們趕上去。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所以那 25 個學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沒有一個學生背上思想包袱。

對於自由、寬鬆的學習制度，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武漢地區曾流行一個順口溜：「學在xx，吃在xx，玩在武大」這個順口溜傳得很廣，不僅校內，在社會上也有傳說，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來，武漢大學似乎是學風不嚴，紀律鬆弛的誤人子弟的學校。更有甚者，校內的一些對改革不滿的少數人，在校外某領導人的指使下，寫誣告信，製造流言蜚語，說什麼「劉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遷就學生，降低了教學質量，辦學方向有問題……」對此，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長黃天祥率調查組來瞭解情況。最後，他們肯定：「武漢大學的教學改革是成功的，學風是良好的，教學質量是上乘的。」

對於流傳的順口溜，我並不在意，也從未動搖我改革的決心。其實，對於「玩」要作具體的分析，看是什麼性質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喪志的玩，那當然是要杜絕的，而「玩學」，即在玩中學，在玩中增長才幹，則是應當提倡的。從這種意義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貶義的了，這正是武漢大學多年教學改革而營造的新的學習風尚。

實行樂學的效果是怎麼樣的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80年代是武漢大學歷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時期。在「金牌精神」的激勵下，大學生們一進校，就自覺地置身於奧林匹克競賽場，瞄準國內重點大學、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和出國研究生的考試，其錄取率連年位居全國的前列。畢業的分配，是最能說明一個學校培養學生質量和社會對學校信譽的認可。那時，我校的畢業生深受國家各部委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用人單位的歡迎，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對武漢大學的畢業生情有獨鍾。

如果說自由，民主的學習環境是快樂學院那麼，20世紀80年代的武漢大學，就是一所快樂學院。事實證明，這樣的學院，是人才成長的搖籃，是發明的溫床。難怪，《中國青年報》一位女記者採訪學校後評論說：「我跑過全國許多名牌大學，很少見到像武漢大學生那樣富有創造性氣質的。」

九、呼喚創造教育

我對創造教育的興趣，是源於我少年時的一個夢。自幼我個性很強，喜愛讀書，愛提問題，凡事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到了少年時期更崇尚創造精神，特別是崇拜「炸藥大王」諾貝爾，立志要成爲一個發明家。但是，正當我而立之年時，由於歷史的誤會，我步入了教育行政管理領域，過早地離開了發明創造的舞臺——化學實驗室，從而貽誤了人生發明創造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但是，我的創造之夢並沒有消失，而是異化成另一個夢：研究創造教育。這是從我崇尚的創造精神和教育管理兩者合成出的一個研究方向。儘管我自己失去了成為發明家的機會，但如果我對創造教育的研究，有助於培養千萬個發明家，這也是值得的。

我研究創造教育始於 1981 年，時值我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之初。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心大力進行教育改革，走一條新的辦學路子，要為在大學實施創造教育而奔走呼號。我的第一篇創造教育論文是《要重視大學生智能的培養》。文章一開頭，就對 17 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提出了質疑。我認為：「知識不等於能力。大家都知道，書本知識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學生，不一定是優秀人才。知識與能力是有差別的，只有當知識被人們所掌握並轉化為獨立工作和研究能力時，它才成為一種力量。因此，應當說創造才是力量，創造才能推動人類社會不斷進步。」論文在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會上宣讀後，與會代表反應強烈，成了飯桌上和寢室裡人們討論的中心。他們議論道：「劉道玉的話講得那麼滿，敢於向權威挑戰，觀點鮮明，行文不拘一格，很有創造個性。」由於這篇文章獲得了一致讚譽，所以被議會評為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會優秀論文一等獎。後來，這篇文章刊載在 1982 年 1 月 5 日《人民日報》上，一些主要觀點被全國多家報刊轉摘。

1982 年 9 月初，由校長作一個報告，向新同學表示歡迎，介紹學校的光榮歷史，對新生提出希望與要求。我歷來作報告不喜歡用講稿，更不願由別人捉刀寫發言稿，也很厭惡假大空那一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我認為，作報告應當有新意，講聽眾最想聽的東西。那麼，作為新生，他們想知道什麼呢？我們又應當以什麼樣的精神來影響他們呢？在那次開學典禮上，我講道：

「同學們，你們來到珞珈山，這裡不僅是一個湖光山色寧靜的校園，而且是一座烈火熊熊燃燒的冶煉人材的熔爐，是一個奧林匹克競技場。從進校的第一天，你們就站到了萬米馬拉松長跑的起跑綫上了，你們的目標就是奪取金牌，努力使自己成爲創造性人才。這金牌，是學習的金牌，也許科學研究的金牌，文學藝術創作的金牌，以及各式各樣的金牌。奪金牌靠什麼呢？除了頑強的拼搏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創造性人才的綜合素質，包括文化、科學、心理、身體和個性（如敢於向權威挑戰、敢於探索求知、敢於冒風險、敢於超越自我）等素質。我們都知道，每一個研究領域或比賽項目只有一枚金牌，爲什麼我們要號召大家都要去爲它拼搏呢？這是因爲，金牌精神比金牌本身更重要，有了這種精神，就可以激勵每個人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助你在未來創業中獲得成功。如果你們問我：武大的精神是什麼？我說：是金牌精神，也就是創造精神。」

這是對創造教育的呼喚，是我對青年學子的期望。我堅信，這就是大學教學改革的方向，我願意做一個探路者。

但是，在 80 年代初期，提出這樣的主張，顯然是超前的，正如培根所正確指出的：「既成的習慣，即使並不優良，也會因習慣而使人適應。而新生事物，即使更優良，也會因不習慣而受到非議。」當時，我提出大學應當培養創造性人才後，的確遭到了不少的非議。來自群眾中不同的認識，並不足爲奇，問題是來自主管領導部門的干預，無疑增添了改革的困難，一位領導人與我進行了面對面的討論。他曾指責說：「劉道玉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大學四年怎麼能培養出創造性人才呢？」我辯解說：「必須要澄清一種誤解，我們提出培養創造性人才，主要是要在學習期間，賦予學生作爲創造性人才所必備的各種素質，並不是規定他們必須成爲發明家或做出創造性的成果，但也不排除個別學生有這種可能性的。如果因爲四年內我們不能

154 把學生培養成創造性的人才，而不去提出這個要求，那麼依此同理，是否因為在四年內不能使學生樹立辯證之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放棄這個要求呢？」討論當然不歡而散，但我並未因此動搖改革的決心。

教育改革與培養創造的人才是什麼關係呢？爲了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在 1984 年 10 月 16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改革與創造型人才》一文。在文中，我強調了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在於：轉變教育觀念，特別是人才的觀念，大力改革不適宜的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培養富有創造性的人才。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廣大青年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收到了來自校內外大批青年們的信件，他們表示贊同本文的觀點。也歷數了舊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中，一封來自河北省任丘油田的青年的信寫道：

「《改革與創造人才》一文，我反復讀了幾遍。您的許多觀點深深打動了我。我這個十幾年未動過感情的青年，卻在您'真正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學生爲數不多'的 22 個字前流下了眼淚！這是既辛酸又喜悅的眼淚。辛酸的是誤人子弟，喜悅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人才觀是培養人才的指導思想，是制定教學計劃的依據，是衡量人才的標準。因此，有什麼樣的人才觀，就會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在系統思考的基礎上，1985 年我提出了有史以來人才觀的六種類型即「工具型」、「知識型」、「全面型」、「智能型」、「創造型」和「審美型」。每一種人才觀，都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而且也是為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服務的。我特別強調，爲了迎接新的技術革命，當代必須確立「創造型」人才觀，大力培養創造性的人才。我還預言，在未來各類教育高度普及和物質極大豐富以後，教育將不再是謀求職業的手段，而是充實自己和完善自我的需要，也即第一需要。到了那個時候，人才觀將是「審美型」的。這雖然是設想，但畢竟是一個

十分超前的觀點。對此，著名學者金馬評論道：「這種高明的主張，可以說，從哲學智慧的高度，較完美地逼近了馬克思所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自己的精闢觀點。」

1988 年春節前夕，年僅 54 歲的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長之職。雖然一時讓我失去了教育改革的舞臺，但我並沒有喪失對教育改革的追求。正在這個時候，我受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委託，主編《教育探索者》叢書。

該書由 7 本書組成，分別反映了教育學的最新的幾個學科分支。其中，《知識·智力，創造力》一書，是由我獨自撰寫的，它是我構思了 8 年想寫而又無暇完成的一個研究課題。在本書中，我不僅對知識、智力，創造力作了充分闡述，而且還對創造教育的理論框架和實施創造教育各要素也作了系統的概括。

創造力到底是什麼？它又是由哪些要素組成的呢？這又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莫衷一是。正如心理學家 J·愛肯所說：「在心理學文獻中，沒有比創造這個課題研究得更多和被人理解得更少的了。」經過研究，我提出了「創造力怎要素說」，即創造力的三級智力要素是由觀察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組成的。這個見解無疑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因為創造力的形成與發展必須遵照「實踐（觀察）—認識（抽象思維）—再實踐（創造行動）」的過程，而觀察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恰好反映了創造性認識過程所必須的三種智力。

一個國家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工作的總綱，規定著教育的性質與任務，是制定各種教育政策的依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國的教育方針是毛澤東制定的，它是由 19 世紀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改造而形成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一方針已不再引用，但是國家又沒有制定統一的、權威的教育方針，以至於各表其述，甚至在政府的文件中把本不屬於教育方針的內容當作教育方針表述，這是令人

不解的。偌大一個國家，爲什麼不組織教育家，通過和論證來制定一個表述完整的教育方針呢？我認爲，這是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在 20 多年裡最大的失誤之一。

出於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教育方針這個重大問題，這既是個人學術研究的興趣，又是進行教育改革的依據。對教育方針的內容，我思考和研究了十多年的時間，於 1995 年寫出《關我國新的教育方針的思考》一文。這個方針的文字表述是：「教育必須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堅持德、智、技、群、體、美六育並重，全面開發人的智力，培養具有創造性素質的多功能人才。」對於這個方針，我是在考察了我國廣大青少年和國民素質弱點的基礎上提出的，目的在於優化國民素質。與通常的提法相比，在多層面上是有區別的，但核心的內容是多了「技」與「群」二字，強調了創造性素質和「多功能性」。這既是我國青少年的弱點，又是 21 世紀人才最重要的特質。因此這個教育方針是有針對性的，是符合時代精神的。

爲了進一步研究和實施創造教育，1997 年我承擔了「創造教育實驗研究」的課題，這是武漢市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下達的「九五」重點科研項目。該課題是以中小學生爲實驗對象，根據創造力要早開發的特點，具體探索實施創造教育的模式與方式。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設計了一種專門適應於中小學的創造教育模式，我把它概括爲「一主、二輔、三結合」模式。所謂「主」是以國家規定的必修課爲主渠道，把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能力貫徹到必修課教學的全過程。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對必修課的教學進行全面的改革，絕不能按照傳統的老辦法進行教學。所謂「輔」，就是開設有特色的選修課，把它作爲培養學生創造思維能力精助渠道。爲此，從 1996 年秋，我爲一所中學的初一學生開設了《創造思維方法》選修課，講授了三個輪回。這是在全國首次開設這門選修課，由於內容新穎，寓科普知識、文藝百科與方法爲一爐，因而深受廣大中學生的歡迎，

既提高了他們的創造思維能力，又提高了他們的學習。三結合是指學與思結合，動腦與動手相結合，開發左腦與開發右腦相結合。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開展各種活動課，如科技製作、小手工藝製作、奧林匹克頭腦競賽等。

近年來，全國從上而下都在大聲疾呼：減輕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實施素質教育。那麼，素質教育與創造教育是什麼關係呢？爲了澄清兩者關係上的模糊觀念，1997年我寫了兩篇文章：《素質教育與創造力的培養》和《培養創造力是素質教育的核心》，前者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獲素質教育徵文一等獎；後者發表在《教育時報》上，被評爲該報當年優秀論文一等獎。

一般說來，在大學實施創造教育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但可惜的是，我國的大學在相當程度上至今仍然是沿用「傳授知識——接受知識」的傳統教育模式。爲了在大學實施創造教育，培養創造人才，我在10多年的研究基礎上，設計了一個「傳授方法——學會學習」的創新教學模式。爲了表述的方便，我以英文縮寫的字母表示，把它稱爲「SSR模式」。其中第一個S是英文詞組 study independently 的縮寫，把它翻譯爲自學或獨立的學習，是由學習者自己完成的一種方式；第二個S是英文單字 seminar 的縮寫，是指大學生在指導下進行課堂討論的一種學習形式，有時也指討論式的課程，R是 Research 的縮寫，它的意思是研究，探索。

SSR爲什麼能成爲一種創造教育模式呢？這是基於以下三點認識：第一SSR分別代表了世界古今教育之精華，特別是經過百多年的實踐，證明了他們是最具有推廣價值的成功的教學方法。第二，這三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創造，是與「三中心」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根本不同的。自學是從學習者本人出發，是依靠學習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有效學習方法。課堂討論是雙向交流，營造一種自由民主的氛圍，以達到激勵和產生創造靈感的目的。科學研究是學習的最高境界。它不是爲了

掌握現在的知識，而是應用已有的知識去創造新的知識。第三，SSR 即反映了教學內容內在的聯繫，又符合由淺入深的認識規律。

總之，SSR 分別代表三種科學的學習方法，它們既是獨立又是相互聯繫的。同時 SSR 又代表三個學習階段，由初級到高級。一環扣一環，一步比一步深入。因此，把 SSR 作為一種創造教育的模式，是有科學根據的，也是具有普遍推廣應用價值的，實施這一模式的關鍵是，必須徹底轉變教育觀念，大膽放手地進行改革實驗。我深信，SSR 模式的全面實施，必將引起大學教學領域裡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創造教育實驗研究」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我主編的《創造創育叢書》。這套書是為適應全國大力倡導創新教育而撰寫的，共由兩輯 7 冊組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套叢書的第一輯是我的 3 本專著，其中《創造教育概論——談知識·智力·創造》和《創造與人生的設計》是我過去舊作的修訂再版，而《創造思維方法大綱》是我的一部新作。這三本書，是我歷時 20 年學習與研究創造教育的心得體會。它們正好是由創造教育理論、方法和實踐三部分組成，堪為我研究創造教育的三部曲。這既是我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研究創造教育的一個總結，又是我獻給以創造為特徵的 21 世紀的一份禮物。

從總體上來說，對創造教育的研究，在我國還比較落後，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要在各類學校普遍推行創造教育，其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尚需全國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堅持不懈的努力！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未完待續)